

作为播种者的郑克鲁先生

■黄福海



上图:2012年,郑克鲁获颁“傅雷翻译出版奖”。

右图:郑克鲁先生与夫人朱碧恒女士。



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大概没有不知道郑克鲁先生的。我是改革开放后几年考进大学的,十多年的思想禁锢,使我们的求知欲达到了顶点,一下子爆发出来。那时候正值所谓“书荒”,凡是古今中外的书,我们都会想方设法地买来读,买不到的就借来读。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复旦外文系主攻英国文学,但是我跟法语专业的同学特别要好,他们向我推荐过法国作家马丁·杜伽尔的一部长篇小说《蒂博一家》。图书馆里这套书不多,我们就借来轮着读。这部小说译文流畅、优美,于是我记住了一位叫郑克鲁的法语翻译家。当时,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只有几十种,有些还是以前旧译本的再版,所以没几年就读完了。随着阅读面的拓展,我开始接触到外国现代派作品。学校的新华书店只有很小的铺面,但是每周新书一到,门口就挤满了不同年龄的教师和学生。装了一车的几百本书,十几分钟就全部卖完了。其中最抢手的有一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装帧精美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书当时已经出到第三册,共六本,同时第一、第二册因为供不应求,还在加印。上海福州路各家书店的供应情形也与学校的新华书店极为相似,货到即售罄。这套现代派作品集,我们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经典来读的,因为它代表了当时最新的文学理念。这套书有三位主编,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在大学里主攻英国文学,但是欧洲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英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都与法国文学密不可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亚戏剧,再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而20世纪初期居住或流浪在巴黎、伦敦等城市的英法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从艾略特的《荒原》中读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于是对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硬着头皮读起了法语的波德莱尔。碰巧我的第二外语是法语,于是便开始阅读法国诗歌。这次冒险,为我打开了英国诗歌之外的广阔视野。法国诗歌跟英国诗歌有诸多

不同,但在精致、优美方面各有千秋。我一直苦于没有一本系统地介绍法国诗歌的专著。我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发现过一部1940年代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也读过一部1970年代编写的《法国文学史》,但总觉得不太满意。直到毕业后很久,我读到郑先生著的那本《法国诗歌史》,才觉得真正挠到了痒处。这是一本专门介绍法国诗歌的书,从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开始讲起,详述七星诗社、拉马丁与浪漫派诗歌,再讲到维尼、雨果、巴那斯派,特别是讲到波德莱尔,以及兰波、魏尔伦、马拉美这几位法国诗歌史上的核心人物,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书的最

后以法国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作结,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就是作家和作品。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横向比较、纵向关联。有些作家虽然属于一个流派,但他们可能是貌合神离的,要注意分析同时期作家之间的区别。比如兰波和魏尔伦,他们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诗风是各有特色的。同样,不同时期的作家,有些表面上属于对立的,但其实却有着内在的继承关系。比如拜伦,他虽然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但他和古典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有些文学史只注重材料的堆积,没有作者自己的观点,缺少分析。郑先生的这本

《法国诗歌史》有史料、有分析,给人以深刻的启发。郑先生具有这样敏锐的史观,跟他亲身从事诗歌翻译有关。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选,他在译诗方面不仅注重译意的准确,而且还尽可能保留了原诗的形式。他认为原诗押韵的,译诗也最好是押韵的。波德莱尔的诗十分整齐,那么译诗就不能长长短短,犬牙差互。郑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在做到语言流畅之外,基本上做到了每行字数都比较齐整,这些是郑先生在译诗方面的特色。郑先生的文学史有译诗作为坚实的基础,所以也相当厚重。

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每当我在思考英国诗歌史上涉及法国诗歌的一些问题时,首先会检出这本书来翻阅,然后再按图索骥,查找各种诗集中的作品,将法国诗歌作为英国诗歌的参照加以研究。

郑克鲁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读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郑先生无论是在著作还是翻译方面,都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列。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沐浴着阳光雨露,但如果缺少一位给我们播种的人,这片土地就会逐渐变得荒芜。就我个人而言,郑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为我播撒了最初的文学种子,这些种子在我的心里成长发育、开花结果。现在我也从事一点文学翻译工作,回想起来还真的要向郑先生等老一辈翻译家说一声——谢谢!

(上接第一版)某些人不搞研究,他们做做作家介绍,写写作品内容,当然这样也可以,但这远远不够。应该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对欠缺的资料进行补遗,是郑克鲁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举例说,比如左拉的短篇小说《苏尔蒂太太》,很多人因不了解其创作背景而认为它不过是画家太太为画家代笔的故事。读了法文材料后,郑克鲁才知道左拉写的是都德。这在与左拉关系密切的龚古尔兄弟的文章里有明确记录,法国专家也考证无误。谁会想到左拉用画家影射都德呢?只读作品怎么会知道这些?所以他在序言里提供这样的资料,让读者知道:哦,写的是都德呀,都德原来是这样一个。郑克鲁的序言一般都比较长,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一些别人没有的可靠材料。

而有时候,翻译作品的序跋也体现了“信、达、雅”的意境。比如郑克鲁在《基督山恩仇记》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非常抓人眼球:“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通俗小说多如恒河沙数,但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其中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佳作。”提到为什么用“恒河沙数”这个词来比喻,郑克鲁说,“恒河沙数”是个跟宗教相关的外来词,不像“多如牛毛”“汗牛充栋”这类词那样常用。这些词虽然很常用但没新意,而无论翻译还是写作,选用不常用的词都是为了更有文采。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悲惨世界》,人们说福来主教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如果我这么译,那就太普通了,谁都能译,没味道。于是我用了‘恫瘝在抱’,它的意思就是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既契合原文又不落俗套。有人以为这样的词没有生命力,是生僻词,然而并非如此,我们应该发掘它的价值。如果读者是个中学生,不认识就去查下词典,看看是什么

意思,然后记住它,增加自己的词汇量。这样的词在几十万字的书中可以出现几个。为什么不能用呢?一本书总要在不同层面给读者一些东西。有的人认为用了成语就有文采了,却忽视了成语也是分层次的。常用的并不稀奇,那些贴切的但一般人平常用的当然可以采用,如何选词不仅是对译者词汇量的考验,更是基本功的一种!所以要想翻译得更好,还是要补课,把中文补上去。”郑克鲁表示,翻译这个工作太难了,因为太难,所以谁都不敢保证一点错误都没有。要做得更好,还是要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努力做到“信”与“达”,至于“雅”与否,还要看读者如何评价。

传道授业:把所知道的倾囊相授

在文学翻译、文学研究中时刻想着读者的感受,希望读者知道得更多,也许源于郑克鲁大半生的主业——教师,他愿意把自己的学识、经验倾囊相授,这让无数学生对这位恩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如今的郑克鲁可谓桃李满天下,几代“郑门弟子”都成了高校、出版社、研究机构的栋梁。而郑克鲁主持编撰的《外国文学史》等教材,也成了许多高校的必读参考书目。

郑克鲁对学生的文字功底要求很高。他认为,要做好翻译,最基本的一条当然是先把外文和中文功底搞好。先把基本功练好,再来做翻译,那么不管翻译哪本书都会翻译得更好。无论翻译对象是《老人与海》,还是新出版的书,效果都是一样的。外文和中文水平提高了,译出来的效果就明显不同。所以他在翻译相关专业授课的同时,更会督促学生提高语言水平。他说,如果学生法文不行,中文水平也存疑,怎么能做出好的翻译?不要以为我们说中文,中文就一定

好,每个人的语言表达是不一样的,语言基础的好坏从日常表达中就能感觉到。

对于青年学子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郑克鲁指出,无论英文翻译还是法文翻译,关键并不是加减字。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字进行处理在所难免,但它们不是关键所在,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原文中独特的句式,尤其是中文里没有的关系从句。郑克鲁举例说,大家评价傅雷的翻译,认为他译得好,但傅雷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优于其他译者的。上世纪30年代,傅雷的译文可以说与同时期其他译者的质量差不多,但到了1940年代,尤其从《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其翻译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质量有了飞跃。这是因为他找到了翻译的窍门,提出了一套有效的翻译方法,遵循先译从句后译主句的原则,解决了关系从句的翻译问题。傅雷的这一翻译技巧被很多人应用,并被证明非常有效。郑克鲁认为,在讲翻译的时候,应该让学生们知道这些东西。

为人处世:质朴低调,淡泊名利

凭借翻译《蒂博一家》以及为中法教育交流作出的贡献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金棕榈勋章(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凭借翻译《第二性》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得“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在翻译、学术、教学上成绩卓著的郑克鲁,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记得,有一次他上郑克鲁家,想看看那枚法国一级勋章,郑先生和夫人找了半天却没找到……很多人不知道郑克鲁出身名门,其曾祖父郑观应学贯中西,是晚清著名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其祖产澳门大屋现在仍是澳门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谈起自己的家世和求学历程,郑克鲁都是淡淡的,不炫耀门第也不炫耀学历。他说,他学生时代喜欢俄罗斯和法国文学,因为考大学那年,北京大学的俄文专业不招生,才转而报考了法文专业。在北大求学的五年中,他以出色的文字能力崭露头角。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说起导师,郑克鲁至今感慨万千:“我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财富,就是扎扎实实地从材料中求取真知。所以我特别注重搜集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郑克鲁也同样感激他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卞之琳先生的教诲:“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于是郑克鲁开始研究当代外国文学,“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大师的先见之明,让我受益匪浅。”

《诗经》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60年,一个甲子,郑克鲁先生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砥砺前行。他曾说过:“我如果放弃研究,放弃翻译,那我人就不在了。”耄耋之年的他,仍旧在伏案工作,他说他正在翻译雨果16岁时写的一部小说,是描写海地黑奴起义的。现在已经翻译了近270万字,还剩30万字。

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卢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贵州插队时,遇到过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酒叫黔台酒,黔台酒的传人世世代代都践行一条家训:“倾一生,为一事”,一直以来都潜心研究酿酒,如今已是第七代,这条家训仍高高地挂在他们的祖屋中。郑先生在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也是倾其一生,成就一事,不为名利,一心治学。他的翻译作品无疑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影响如美酒,历久弥新,醇香至美。